

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大的报界企业家,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他的办报思想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战斗精神。他曾告诫报社同仁:“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

史量才：为乱世存信史

李 岚

《申报》是中国近代一份赫赫有名、影响深远的报纸,在其近百年的沧桑历史中,原《申报》总经理、爱国民族资本家史量才为它的发展直至辉煌鼎盛做出了重要贡献。

史量才(1880—1934),原名家修,祖籍江苏江宁。他从小接受传统教育,戊戌变法后,受维新思想影响,放弃科举。1905年,他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1907年,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史量才参加了江浙两省绅商拒借外资保护路权运动。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史量才结识了上海的革命党人陈其美等,参加响应武昌首义、谋求江苏独立的活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议和期间,他参加了南北议和的协商工作。

振兴《申报》的新兴企业家

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和政权的嬗变,史量才逐步看清了反动军阀和流氓政客争权夺

利、尔虞我诈的真实面目,对革命抱着满腔热忱的他感到十分失望,从此把主要精力转向新闻事业,试图通过社会舆论力量来监督当局,激浊扬清。

1912年9月,史量才在张謇、赵凤昌等人的支持下,接办了当时已亏损数年、发行量只有7000份的《申报》。为摆脱惨淡经营的局面,史量才首先赢得江浙资产阶级的资金上的投入,接着起用张竹平、冯子培、王尧钦等管理人才,对《申报》逐步实行现代化、企业化管理。同时,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积极开拓广告业务,大大增加报纸收入,并以敏锐的经商头脑分析市场行情,适时囤积廉价纸张,降低生产成本。由于经营有方,《申报》在短期内面貌焕然一新,业务逐渐增长。1916年,史量才收购了合资人的股权,独家经营《申报》。

现代报纸的最大特色,一是销量大,二是传递消息快,这就需要

绍兴古称会稽,越州,向有文化之邦美誉,藏书家代有人出,藏书楼更是星罗棋布。绵绵不绝的著书、刻书、藏书,不仅记录了越地的历史文脉,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越地藏书最早见于“禹穴藏书”的传说。司马迁上会稽,探禹穴,在《史记》中写道:禹治治水七年未成,后来在会稽山一悬崖石窟中发现“金简玉书”,从中获得“通水之理”,才把泛滥的水患制服,使百姓绝水之患。后人并未见过“金简玉书”之类,想来权当是神迹罢了。

绍兴藏书可靠的记载始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绍兴一地藏书已成风气。以东山再起而入史册的谢安及其谢氏家族,以兰亭序而名传千古的王羲之及其王氏家族,都是书香门第。南朝亦有山阴人孔休源,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家中“聚书千卷,手自校练”,因其藏书宏富而闻名遐迩。

隋唐以降,绍兴始称越州。大唐盛世诗风大炽。长庆二年,元稹迁浙东观察使兼任越州刺史,其时,越州在州城创设了“丽正书院”,诸暨则有“溪山书院”。至五代,南唐会稽人徐锴,嗜嗜藏书,颇致力于收藏,《南唐书》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

宋元时期,雕版印刷日趋成熟,为书籍的大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也为藏书家提供了更多的书籍来源。据史料记载,宋代已形成了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四大藏书系统,一些藏家还开始了对藏书的研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现存最早的解题目录。其时的绍兴藏书家已蔚然成群,较著名的有新昌的石氏家族(石待旦、石景衍、石公弼、石邦哲)、山阴的陆氏家族(陆佃、陆宰、陆游、陆子通)、会稽的诸葛家族(诸葛行仁、诸葛行敏、诸葛千能、诸葛十朋),以及上虞的李光、会稽的莫子纯、刻川的姚宽等。新光石公弼官至兵部尚书,《嘉泰会稽志》记其藏书“无一不有”。可惜其子不能守而散出,幸得其侄石邦哲将书重新购回,并建“博古堂”以藏之。山阴陆氏亦是屈指可数的藏书大家,从陆佃开始历经四代,刻书不止,藏书成癖。书载,陆宰性好读书,归隐山阴后,曾筑双清堂、千岩亭,藏书达一万多卷。陆游宦游四川,出缺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益巨。

有明一代,举国崇文。洪武元年曾令书籍、笔墨不得征税,加

上科举发达,文人著作汗牛充栋,《千顷堂书目》就收录明朝人著作1.5万余种。官府、藩王、书院、寺观、私家宅塾、书肆作坊无不刻书,明翰林馆阁、两京胥监、各部司署、州县府衙、郡邑诸学、大夫士人靡不藏书。此时的绍兴文风之盛可用辉煌来形容,尤其是从嘉靖到万历年间,人文荟萃、大师辈出。文风的盛行亦带来了藏书的繁荣,迄今可查考的藏书家有四五十家,比较著名的有骆象贤、骆问礼的万一楼,钮清、钮纬的世学楼,张元汴、张岱的不二斋等,其中又以世学楼和澹生堂最为著名。钮纬的世学楼不仅有世所罕见的宋元珍本,而且有大量抄录的稀世秘本,总计达上万卷之多。据国家图书馆所藏《会稽钮氏世学楼珍藏图书目》的记载,他对每一种图书的记录不仅注明书名、卷帙和作者,还对该书作了简要解題,以及行款格式、版本判定,甚至考述其流传。祁氏澹生堂收藏图书9000余种、10万余卷。祁承燾在全面总结收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撰写了《澹生堂藏书约》,包括读书、购书、鉴书、聚书等专章,把收藏学和管理学结合起来,并提出且运用了“因”“益”“通”“互”四字分类目录原则。这些原则被后世广为使用。

清入主中原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兴文字狱。不过清统治者目的只是杜绝反清思想,照例采取了科举的方法笼络文人人才,使著书立说、刻书藏书又蓬勃地开展起来。此时的绍兴因文人众多,藏书之富亦到顶峰,藏书家不下百家,其中以李慈铭、姚振宗、平步青等人的藏书最享盛名。史书记载,李越缦“直以书为妻妾,禄糈所入,悉以购书”,其藏书编有《越缦堂书目》;姚振宗“肆力聚古册,隐住读书”,到他四十岁上,将藏书编为《师石山房书录》,“录书三千二百余种,六万卷”;平步青“烟茶掌故校勘之学,著书二万卷”。

清末民初,旧式藏书渐趋式微。其时,绍兴尚有一批有识之士锲而不舍地搜寻古籍留存后世,如汤寿潜的琴石山房、王绶珊的九峰旧庐、王子余的万卷书楼等。但此时的三大革命性变革,使古籍收藏几乎走到了尽头:第一大变革是铅活字等西洋印刷技法的引进,较之于传统的雕版、木活字排版技术更经济、科学;第二是新式学堂的引进,使大规模的平民教育成为可能;第三是公共图书馆的诞生,使藏书不再神秘。而在这场大变革中,又是绍兴人得风气之先。1902年,乡绅徐树兰倡议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上千年的传统藏书史从此告一段落。

大厂房与现代化的印报设备。为改变《申报》原有的极为简陋的馆舍及条件极差的设备,史量才不惜承受经济困难的压力,致力于印报技术的现代化。1918年,他用70万元新建了一座共5层100多个房间的大厦作为《申报》的馆址,并从美国购进两台新式印刷机投入生产,其速度与4台普通印刷机相当,可同时印报18张,每小时印报3万余份。其他如铸字机、纸版机、铅版机、制铜版机和锌版机等亦全部加以更新,《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善的报纸。1922年11月,英国报界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来到中国,惊叹世界上唯有《申报》及《泰晤士报》有此现代化的规模与气势。

在改善技术设备、创新经营理念的同时,史量才还不拘一格、不惜重金,网罗人才为《申报》服务,如聘请进步作家黎烈文任副刊《自由谈》主编、刊登茅盾、巴金、郁达夫、鲁迅等著名左翼作家的文章。仅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就发表了鲁迅140多篇战斗性很强的杂文,使《自由谈》一度成为反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刘海粟因“模特事件”落难巴黎时,也被史量才聘为《自由谈》特约通讯员,每月酬金百元,这是当时《申报》的最高稿酬。在得知陶行知从日本回国后,为了将科学知识普及到劳苦大众中去,史量才不仅资



中报馆前整理分发报纸的商贩

■文摘

“这梦幻奇景是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成,雪松木做梁,以宝石点缀,用丝绸覆盖;祭台、围房、城堡分布其中,诸神众鬼就位于内;彩焰熠熠,金碧生辉……”1861年11月,法国作家雨果在根西岛的寓所写下这些关于圆明园的文字。他当然没有亲眼见过圆明园,所有的想象都来源于从18世纪中叶开始流传的圆明园传说。

传说

最早的传说源自那些在圆明园服务的法国传教士,最著名的有两位:王致诚和蒋友仁。

王致诚作为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因杰出的绘画才能被引荐入宫为乾隆皇帝服务,参与圆明园的设计和绘图。在1743年写给达索先生的信中,王致诚详细描述了他眼中精妙绝伦的圆明园。后来,这封信在1749年以“传教士书简集”的方式公开发表,随即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此之前,崇尚齐整划一的法国人大多看不起中国园林的价值。路易十四派到清廷的传教士李明在写《中华新志》时,甚至把中国式园林斥为“荒芜”。100多年后,法国人的审美发生了很大变化,王致诚由衷地称赞圆明园“是一座真正的人间天堂”。

《传教士书简》里还有一封法国神父蒋友仁在1767年写给巴比翁的信。蒋友仁为中国皇帝服务了30年,他是长春园大水法的设计和监造人,在给巴比翁的信中,他热情洋溢地赞美圆明园,“在中国园林

助他十多万洋,聘其为顾问,而且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共商《申报》改革大计。人才济济的《申报》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史量才的锐意改革、苦心经营下,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申报》的发行量急剧上升。与此同时,还连续出版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和《中国分省地图》等书刊,读者面不断扩大,报社资金积累亦成倍上升。1912年史量才等以12万元购得《申报》,到1938年,《申报》仅有形资产就达150万元,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拥有读者最多的报纸之一。

以《申报》为基础,史量才不断拓展业务范围。1921年与南洋侨商合办中南银行;后又集股创办民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1927年经办《时事新报》,之后购得其全部产权;1929年从美商福开森手中收买《新闻报》大部分股权,一跃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新闻界最大的报业集团,史量才本人也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界企业家。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

史量才抱着“新闻救国”的理想,以办好《申报》为终生事业。他常说,“新闻家,国医也,……一日不死,则国医之重任一日不容息其肩。吾知报界中不乏年富力强饱学深思之士,当此国病垂危,必能併力同心诊察其症结所在,



史量才像

处方下处,起死回生,挽救浩劫于万一”,以此来呼吁作为舆论先锋的新闻界同仁在国运倾危之际戮力同心,寻找国势衰微之病因,共同担负起时代使命和民族重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痛感国土沦丧,生灵涂炭,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在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士的频繁接触中,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思想日趋激进,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转折。他曾告诫报社同仁:“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坚决主张捍卫新闻独立与新闻自由。

《申报》在史量才的主持下,



《申报》



早年申报馆

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后,宋庆龄撰写《宋庆龄之宣言》予以严厉谴责和抗议,但没有报社敢于公开发表,史量才得知此事后,当即决定全文见诸《申报》。他还支持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冲破新闻封锁,顶住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在《申报》上发表民权保障同盟的宣言和各方函电,对其活动进行全方位跟踪报道,使民权保障同盟正义的呼声传遍国内外,扩大了同盟的社会影响。《申报》不仅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退让,而且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成为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民主的阵地。

《申报》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令国民党当局感到莫大的恐慌,蒋介石设立新闻检查所,给各报派员督导,唯史量才坚拒不纳,否则《申报》宁可停刊,以维护其“独立之新闻乃世界幸福之所赖”的办报理念。为控制上海舆论阵地,蒋介石政府试图拉拢史量才,给他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荣名高位,但他坚持正义不为所动。由于言论自由进步,1932年7月至8月,《申报》曾被蒋介石手令禁止邮递达35天之久。之后,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威逼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万军队”,史量才回敬说:“我手下也有100万读者,我们也不敢得罪。”

腐蚀拉拢、威逼利诱均告无效后,1934年11月13日,蒋介石指使戴笠派遣军统特务将其暗杀。

秉持“以史自役”办报方略

史量才认为报纸是对历史客

观忠实的反映,应成为“史家之别裁,编年之一体”。要为后人修史建立完备的档案,必须有完整的资料,因此报纸肩负着“通史之任务”,报社全体同仁必须“以史自役”。

在接手《申报》之初,史量才发现《申报》整整40年竟未留存一份资料,他上任伊始就决定收购自1872年4月30日至1912年10月20日的全部旧《申报》,为此反复刊登征集广告,最终从民间一位收藏者手中征集到了自问世起整整40年的几乎所有《申报》(仅缺7张)。史量才在1928年的《申报》二万号庆祝会上表达了百般搜求之用心所在:“慨自17年中,兵争倣扰,而国家之文献荡然无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戈戈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申报》秉承他“以史自役”的办报方略,尽力全面、详尽、真实地记载每天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成为记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详实的“百科全书”。

史量才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办报思想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战斗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史量才忠于新闻事业、尊重客观事实、不畏强权的办报精神,值得今人纪念与学习。

作者简介

李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现为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思想史,发表过各类学术论文数十篇。

法兰西与圆明园

杨程屹

里,眼光绝不会疲劳,因为它几乎总是被限制在同视力范围相称的空间里。你看到了一个景,它的美丽打动你,使你迷醉,而走过几百步之后,又有新的景在你眼前呈现,又引起你的赞赏。”

传教士们不吝赞美之词的书信一经公开,立刻燃起了欧洲的中国园林热,欧洲王公贵族千方百计搜集中国园林资料,竞相仿造。1753年,瑞典国王在斯德哥尔摩以外的夏宫建造了“中国宫”;1761年,英国人为威尔士公主奥古斯塔修建了一座中国宝塔,后来那里成为英国皇家植物园;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甚至想仿造一座圆明园。

从传教士的述说中走来的圆明园是神秘的、壮丽的、完美的。雨果在给巴特勒上尉的一封信中就写道:“圆明园不仅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对于法兰西人而言,圆明园是一个不真实的梦境,直到1860年。

战利品

1860年,雨果在《见闻录》中留下笔记:“此时此刻,欧洲正在砸碎中国,这个可怜的大花瓶,早已满身裂痕了。”雨果所指正是英法联军远征中国之事。在这次远征中,法兰西人不仅走进了传说中的圆明园,而且动手劫掠了它。

当法国远征军推开大门,目瞪口呆地站在圆明园里,看到那些雕龙画凤的亭台楼阁、星罗棋布的花园湖泊、灼灼生辉的珍宝,“他们一窝蜂地向大堆大堆的金

银财宝扑去……”法国远征军总指挥蒙托邦将军和英国人一起组建了战利品挑选委员会,为拿破仑三世和维多利亚女王挑选最漂亮的礼物。疯狂掠夺3天后,在口袋里塞满了金子和珠宝的法国人撤离,留下身后满目疮痍的圆明园。10天之后,英国人一把火将圆明园烧成了废墟。

在法兰西史学家和贵族们对远征大唱赞歌之时,1870年雨果却在《全民公决》中指责拿破仑三世:“联合英国给中国看看欧洲这个文物破坏者的形象,用我们的野蛮行径让野蛮人目瞪口呆,和毁损帕特农神庙的额尔金的儿子合伙焚毁圆明园。”此时,作为拿破仑三世政敌的雨果并未意识到,圆明园是中国皇帝的虚荣,1860是法兰西皇帝的虚荣,正是这两份虚荣最终成就了法兰西收藏家的虚荣,包括雨果。

收藏品

就在雨果写就著名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斥责“两个强盗”的4年后,1865年3月30日,雨果在手记中写道:“买下一大批中国丝织品,卖主是个参加过远征军的英国军官,东西是他从中国皇帝的圆明园中抢来的。”在雨果根西岛的“高城堡”里,至今还挂着用圆明园丝织品制成的天幔。在雨果为情人朱丽叶设计的厅室里,则摆满了佛像、瓷瓶、陶器等来自中国的艺术品,这些大部分来自圆明园。

当然,圆明园珍宝的最大收藏家是拿破仑三世。他将从圆

园得到的珍宝交给了以艺术品位闻名的欧仁妮皇后打理。为了陈列这些来自远东的艺术品,1863年,欧仁妮皇后下令整修了枫丹白露宫底层面对的池塘、英国花园和喷泉庭院的4个大厅。从此,圆明园的珍宝就躺在法兰西皇帝的寝宫里。当然,除了枫丹白露宫以外,法国各地的博物馆也珍藏了来自圆明园的战利品。

虽然雨果在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振臂高呼:“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个不义之财归还给被劫掠的中国。”但时至今日,这仍是天方夜谭。谁也无法否认,1860年远征的法国军人都凭着在中国的战利品发了财。

实际上,几乎所有洗劫圆明园的当事人留下的资料里都不讳言掠夺了圆明园的财富,但他们矢口否认火烧圆明园,并异口同声地谴责英国人的放火是“哥特式的野蛮行为”。

1864年,法国《环球》杂志刊

发了汉学家鲍吉耶的文章《探访圆明园》,用详实的图片和文字呈现了圆明园的原貌;1867年,在巴黎世博会上,法国人造出了圆明园的仿作;1872年,法国历史学家亨利·高第亲自前往北京参观了圆明园废墟,他书里描述了繁华落尽后的圆明园创伤:“低处静静的湖泊里,开满了荷花,横卧着一座高大的石桥,与岸边满目疮痍的景色形成鲜明对照……”

对于具有中国情结的法兰西艺术家、文学家和哲学家而言,圆明园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一个神话的历史;但对于大部分的法兰西人而言,它已经退化为《小罗伯尔词典》里一个符号式的词条:“圆明园——最光明之园,中国皇帝夏天的行宫……曾是‘万园之园’,占地350公顷,它藏有大量无价之宝与图书……1860年整个园子被法英联军洗劫,随后又被额尔金爵士付之一炬。”

(摘自《看历史》杂志2010年10月刊)



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残迹